



地名掌故

岁月如歌徐家桥

□姜松延

穿越徐家桥近300年的时光隧道,其间的乡野轶事、人文掌故,是这一方片区的生活沉淀与历史见证。



清宣统《通州水陆道里详图》上的徐家桥

位于通州四安镇区东北隅的徐家桥(惯称徐港桥),初为桥名,继成自然村落名,后又作为行政村名沿用至今。穿越徐家桥近300年的时光隧道,其间的乡野轶事、人文掌故,是这一方片区的生活沉淀与历史见证。

仁爱慈善传乡里

清乾隆初年,徐氏“十一世祖玉成公迁(陈家酒店东)张家港,造徐家桥”。其后人则仁爱传家,屡次出资重建或维修该桥,留下一段世代接力、造福乡人的慈善佳话,并续写了一个个动人的慈善故事:1906年2月,徐、王两家选址桥南西侧,联合创办私立正道小学(后改称四安市立第二小学、徐桥小学)。世居桥南的徐秀芝,民初由南通医校毕业后,即回乡悬壶济世。他“活人无量,凡遇贫老,不计酬金且施以药。四乡受其惠者,莫不感谢”。1915年3月,根据历年捐助南通公益款项,经前知事储南强、苏常道尹殷鸿寿详请分别褒奖,由巡按使批复:“广生厂等四十七户捐助公益,热忱可嘉,应如所请,由本使给予匾额,以资奖励。”其中,徐家桥之徐桂林获赠匾额,上题“寒士欢颜”四字,褒扬其善举。他“曾被选为自治总董,创设学校,重建桥梁,送诊施药,积极进行,地方人士靡不敬仰”。时人曾赞“徐董持躬正直,对于公益事项力任劳怨”。据载,1915年举行国民会议员南通县初选,徐桂林与张馨兄弟及刘桂馨、孙徽等同在25名当选议员之列。

另有徐继震(子云),光绪年间国子监生员,后接受新式教育,毕业于上海法

政学校,自宣统年始热心慈善公益,造福地方。如克服阻力,多次发起或捐资浚河开港,以兴水利;造桥修路,便利交通;建亭施药,泽被百姓。

徐热心教育,曾助资创办四安第十四校(坝桥小学),捐助四安第一、第二小学(即四安小学、徐桥小学),并因“热心兴学,慨助巨资”而屡受县署褒奖。为传播商业知识,他于1916年在四安“南市稍自建新房内设立商余讲习所”,次年“又添设富民实业讲习所”,并创办徐氏私立国民义务学校。且以上学费,一律免收,“每日各项开支系徐君担负”。

1929年6月,由徐继震发起的四安、石港红十字会在坝桥小学中山堂楼上成立。后又联合族弟徐鲤泉等设立医院“施医、防疫、戒烟”。鉴于他在慈善公益与红十字工作方面的影响,1932年4月,经选举,由徐继震接替张孝若,出任南通县红十字学会第二任会长。

人杰地灵出英才

徐、王乃徐家桥一带的两个大姓,也是当地两大望族,该二姓有两个共同点,一是多有土地出租,即地主比例较高。然徐王二姓地主为人和善,如其中的徐鲤泉,业佃关系一向和谐,因其从不催租要债,以致当地流传着一句“徐鲤泉收租——明年再说”的歌后语。二是当地崇文重教之风浓厚,徐王两姓尤重教育,合资创办的徐桥校在1913年“由县长专呈省长规定为南通县模范校”,系全县首批模范校。二姓子弟,读书从教者尤多。以王笃初(燧升)为例,他本人于

辛亥年毕业于通州师范;其子王履中毕业于南通农校,任教于女师、通中等校;其女王焕庵毕业于女师,先后在四安、城区多所学校担任校长;其婿徐欣木(著名画家徐累祖父)自通中师范科毕业回乡后,即献身农村教育,成为深得四安学子及当地乡民景仰的一代贤师;其弟王炎升(希农)、王樾升(作薪),前者通师毕业后回到四安,一生致力于乡村教育。后者毕业于东南大学,作为棉植专家,抗战前任职于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。

徐家桥徐鲤泉、徐则尧等人,为通师早期学生。徐是推动四安社会自治的主要人物之一。1926年,南通县恢复自治,徐鲤泉被票选为总董事。1927年,任县教育局董事及四安董事办事处总董。另有王聘时,1918年任四安区董,20世纪20年代任职县议会、县水利会。

今属该村的史家庄史氏家族还走出了史友兰、史佩璋等名师,其中的史友兰颇具文学、体育及书法才华,20世纪30年代,曾与同为通师校友的吴天石、黄稚松、李素伯一起,被誉为“四小才子”。

前尘往事留印记

属于徐家桥的骄傲不只在于慈善义举,人才辈出,还有留存在这片土地上的独特记忆。清代徐家桥,所在地俱为民田,其东北与石港接壤,是民田与灶田分界之处。桥东数里是一片荡田,人烟稀少,经地方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开垦,东草荡始渐成良田。

徐、王二姓开设“同仁恒”布庄于酒

店街,系与“冯德源”齐名的布庄之一。1920年春,受张謇实业救国思想与实践的影响,王聘时、徐鲤泉与孙徽等发起,“就南通县四安市建设工厂,纺织兼营”,该厂“规定纱机万锭,股额八十万元”,赞成人为张馨、张馨,收股处就在同仁恒布庄。而在众股东中,又以“徐王二姓股份最大”。

王聘时之子王杏翘则走上另一条建设家乡的道路。他自苏州省立医学专门学校“学成回里,设医院于四安”,创立了当地最早的西医医院。王在久安厂破产后于1924年“应姜堰普济医院之聘赴泰供职”,两年后返通,创办东新医院于东门,直至解放后接受私有化改造。值得一提的是,1940年,时驻四安的中共江北特委负责人赵毓华突患疟疾,经歇业在家的王杏翘诊治,得以痊愈。

搜寻地方史料,屡见徐家桥身影。

1927年8月,四安区农民协会成立,下属七个分会中的一个分会即设徐家桥。次年12月,为维护地方治安,新任四安公安分局长芮文珊积极实施冬防,除“分班巡逻,实行十家牌更”外,还在“重要村镇,添设临时派出所”,其中,最早成立的便是徐家桥派出所。

战争年代的徐家桥,更是在南通地方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。1938年南通沦陷后,南通县教育局借徐桥小学校舍办公两年,推动了全县战时教育的开展。1942至1943年间,梁灵光又以该村王希农宅作为临时县政府,领导抗战。徐桥小学被南通县中作为其师范科学生的定点实习校,培养了众多教育师资力量。当年,县中学生党员江中则带领进步学生走村入户,在此宣传抗日,鼓动革命。而20世纪50年代小学课文《第二十四号船》里的渡江战役英雄排长王金文,也来自徐家桥。

锦记猪行。丁德记、倪性记、丁恒记、朱协记猪行,也有一定名气。值得一提的是锦记猪行老板何绍宗,论学历,他持有中央大学毕业文凭;论财力,承祖世余荫有良田上千亩,称得上大地主,从事生猪贩运生意后,在张黄港有阉厩若干,有大帆船20多艘;论人品,言谈举止,一副沉稳雄厚的绅士风度。可是他却投身龙蛇杂处的猪行行列,名闻遐迩。可见,当年人们的择业观也是多元的。解放前夕,何绍宗去了台湾,后任大学教授多年。

张黄港的猪行有名,张黄港的其他商业也很有名。张黄港鼎盛时期是民国初年至抗战初期。当时,在行政建制上如皋县设有张黄港镇,并设有行政、公安、税务、海关、邮政、电信、水上交通管理各部门,港东建有水上码头,长江大通轮船公司所属的志大、正大、隆大、鸿大轮船和达达轮船公司的大班、大明、大吉、大豫轮船,每天上行、下行两班,都停靠在张黄港。英商外轮太古、怡和则不定期靠港卸货。沿江苏北地区的渔船也纷纷汇集张黄港在长江捕鱼,还有航行江阴、无锡等地的装货帆船和本港装载生猪的大帆船常年汇集在港口码头。

在冬季鱼汛期更有宁波商人的大轮船来港销售黄鱼,加之接引长江航轮的大划船又在水上穿梭,码头送往迎来,川流不息,喧闹非凡。



历史人物

杨同芳谒见朱自清

□彭伟

杨同芳(1915—1963)是如皋籍教育家、儿童心理学家。他还是如皋新文学的拓荒者之一。20世纪20年代末,杨同苏、杨同芳兄弟与韩德培(著名法学家、武汉大学教授)创办了如皋历史上第一本新文学期刊《嚶鸣》。20世纪30年代,他又前往上海求学,继续文学创作。1937年7月,他于北京清华园谒见了散文家、诗人、教育家朱自清先生。

朱自清先生逝世于1948年8月12日。次日,杨同芳翻阅报纸,获悉噩耗,惘然许久,事后写下悼念朱自清先生的一篇忆文。笔者无意读到此文,颇为感叹。卢沟桥事件(“七七事变”)爆发前三日,即7月4日,杨同芳怀着崇敬的心情,独自走进清华园中,拜见朱自清先生。彼时的北平正笼罩在紧张的空气之中,清华园时不时听见枪炮声。清华学子们,大多并不惊慌。杨同芳很想向朱先生询问对时局的看法。

两人见面后,朱先生给杨同芳留下的印象是“风度潇洒,谈吐亲切,举止端重”,待人“温厚、诚挚”。朱自清谈起时局及文化界,或多或少流露出悲愤的情绪。他知道杨同芳是来自上海的文艺青年,便先向杨先生询问些许有关上海文化界的问题。随后话题转向抗日,朱自清激动地向杨先生说道:“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,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,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。”这是朱先生心目中当时中国作家应该选择的时代方向,令杨先生深深感动。临行前,他还为杨先生题字留念,落款时还添上“时远处有炮声”六个小字。在忆文后半部,杨先生赞誉了朱自清先生为中国文坛做出的诸多贡献:朱先生“极力主张写作须纯粹,避用陈言套语,开进一步口语化的新风格”等。

两人作别后不久,抗战全面爆发。待到抗战取得胜利,杨同芳还盼望再见朱自清,不想朱先生因为胃病和贫穷,早早过世。杨同芳颇为无奈,十分遗憾。

农学专家王樾升

□何美红

1921年,为推行改良棉花品种计划,通泰盐垦五公司联合银团建立农事试验场。9月,张謇嘱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聘过探先主持试验场,同时在大毕业生中“聘王樾升、叶识两君为试验场技术员”。“两君均于受聘后即赴南通三余镇试验场任事。除根据过君所定办法,接收及经营大有晋公司所拨给五百余亩之试验场地亩外”,并“赴五公司调查其过去及现在农事上一般状况。王君所到之公司为大有晋、大裕、大赉”,随后即投入于“选育优良中、美棉种籽,散给农民;研究棉作病虫害之防治法;试验他种作物”等工作。

王樾升(1895—1976),字作薪,南通县四安区徐家桥(今属通州兴仁)人。“苏省稻作害虫以螟为最烈”。上世纪20年代后期,王樾升入职江苏省昆虫局,任技师兼稻虫研究所主任。他积极投身虫害防治。当年媒体曾报道稻虫股投王樾升偕副技师郑同善、柳支英等,连续在昆山夏驾桥研究二、三化螟生活史、水稻种植期早晚与螟害之影响。以五种颜色玻璃灯试验诱蛾效能,再就诱蛾灯下考察三化螟蛾发生最盛期。研究拟定并推行治螟计划,“派员分赴各县区指导民众从事采卵诱蛾等工作”,往长江南北指导合式秧田、采卵治螟,试验水稻抗螟害品种等。在王樾升等人的努力下,“与1928年秋收相比,1929年吴江县每亩增收糙米五斗以上,治螟成效显著”。

1936年,王樾升受实业部之聘至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。1937年11月,他随实验所西迁成都、重庆,但此后却鲜有他的消息,笔者仅见一篇《申报》报道:1948年1月,农林部病虫害机械技术会议在上海开幕,“沈宗翰、刘廷蔚、王樾升等专家四十余人,联合国粮食会议昆虫专家提尔博士,亦来沪出席”并致词……

上海解放前不久,王樾升出任农林部上海药械总厂副厂长,后被送往位于黄河口的广饶农建二师,并随之移垦北大荒,直到1962年退休定居北京。



传家宝

灯巢

□程太和

灯有巢吗?有的!灯巢就在泥土墙的墙壁上。

过去,南通北三县多数人家住的泥墙草屋,住泥墙屋的人家,墙上开了一个小洞,那小洞就是灯巢。灯巢就是放置煤油灯的地方。灯巢里放的煤油灯是一种简易的瓶儿灯(墨水瓶灯),这种瓶儿灯是煤油(也称“火油”,老一辈人称之为“洋油”)传入后才出现的灯具。用一只小口的玻璃瓶瓶口,再到集镇上敲白铁皮的摊儿前花三五分钱买一只灯头,装上棉纱或草纸卷的芯子即可点燃。瓶儿灯一般挂在中柱上,或放在圣柜(米柜)上、灶角上、石磨上。为了节省煤油,一灯二用,则可在泥墙上开个小洞(灯巢),将瓶儿灯放在灯巢里。灯巢设计在堂屋与厨房或堂屋与卧室之间的墙壁上。开挖灯巢很简单,我们小孩子都会,用小锹在泥土墙上挖一个宽约十几公分(下宽上窄)、高约二十几公分的小洞即可。我家的灯巢安排在堂屋与厨房之间。厨房的东南角是锅灶,锅灶旁边是水缸,水缸西侧是石磨及磨盘(俗称“磨塘”),灯巢就在石磨上面一点点。瓶儿灯有时放在灯巢里,有时也放在石磨上。晚上,父亲在灶角上洗碗、洗锅、抹灶台,母亲在磨盘旁边缝补衣裳,他们则在灯巢下面的小桌上做作业。瓶儿灯长期放在灯巢里,灯巢上面的墙上都有一股黑黑的印儿。有时我们也将灯具拿下来放在小桌上做作业,点燃的灯有一股黑烟,两个鼻孔都被熏黑了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条件好的人家也用了罩儿灯(又称“洋灯”)。罩儿灯的灯座是厚厚的玻璃,下面有圆圈的座基便于摆放,中有圆圆的腹部是装火油的地方,颈部有螺旋安装灯头,灯头是铁皮的,既好安放玻璃罩又好安装棉制灯芯,玻璃罩既能挡风又能聚光,但使用时间一长容易被烟熏黑,因而要经常擦拭。一般人家平时舍不得用罩儿灯,只有来了尊贵的客人才显摆一下。灯巢较小,罩儿灯放不进去。就是可以放进去,也舍不得,万一把灯罩儿摔坏了怎么办?

现在还有多少人晓得过去有瓶儿灯,有灯巢啊!但它曾发出的光亮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上。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写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并茂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史海回眸

猪贩,俗称“猪贩子”,现在叫“农民经纪人”。如皋历来为江苏生猪养殖大县,养猪的农户多,贩猪的人也多。

上海通州路是如皋猪贩最集中的地方

旧时做猪贩生意,只要人头熟,略具胆识,敢于闯荡就行。一般小猪贩并无多少本钱,只要给农家一点象征性的订金即可达成交易。待他们从上海卖猪回来,再拖上一段时间才与养猪户结算付款。有的猪贩,起初从邻居及至亲友处收购肥猪。如果想求发展,就得收罗几个帮手相助跑腿。这些充当帮手的人,大多能言善道,腿脚勤快,能够在左邻右舍串门入户。他们对附近各村各户养猪情况了如指掌。猪贩就靠他们获取产地情况。何况这些人在当地具有一定“威信”,交易谈到最后关头,万一还有小小的差距,该得“拿弯转舵”时,就凭他们一句话,变户总得也要给个面子。所以猪贩对他们依赖很深。

上世纪30年代上海虹口区有条泥汊不洁的沙石路叫“通州路”(今日之通州路已不可同日而语)。那时,如皋地区开猪行的老板大多集中在这条路上,各家猪行都备有几个房间,每日三餐流水席接待猪贩。有些猪贩到了上海,生活要比家里舒

适,颇有乐不思蜀之感,因之流连忘返。而猪行对于纷至沓来、川流不息的猪贩从来不会下逐客令。表面上看,猪行从猪贩身上得到的佣金只有生猪成交价的百分之十,然而,猪行还有另一敛财的手段——聚赌抽头钱。猪贩手中有钱,赌局就很可观。牌牌结算,猪行抽取十分之一为头钱,从早到晚,所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有些“天不光、人不光、钱不光”不肯离赌桌的猪贩,输掉钱想攀本,甚至连续在赌桌三五夜不下来。常言道“十赌九输”。猪贩们赌到结局四个人都是输家。而猪行老板从桌角上大把抓走的头钱,往往比佣金多得多。这样,猪行当然欢迎猪贩多住、多玩、多赌了。猪贩们夜以继日地坐在赌桌旁,赌兴虽高,有时身体也吃不消。身体吃不消,自有香烟伺候。这种香烟可不是猪行里放在赌桌边任由猪贩取用的普通货,而是由与赌客“时相左右”看“谢头”(在赌桌旁看赌之意)的清客们不久便上瘾了,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吸毒者,从此吸毒变成挥霍钱财的无底洞。有的猪贩弄得走投无路,就有清客来引导其贩毒。当年毒品泛滥于城乡,猪行任凭那

些清客与猪贩往来,不算放纵,也算默契,难免其责。但一般而言,猪贩中恶者、坏者、败者毕竟是少数。大部分猪贩在生猪出售后,等待钞票到手,或远赴芜湖,或近至姜堰、曲塘、海安一带购买粮食豆饼,以偿还欠养猪户之款。养猪户正可以用猪贩付给的大麦、豆饼等饲养下一批次猪。而猪贩以粮饼付款自然又会从中赚取一笔小钱。也有的猪贩就在上海采购华洋杂货运回家乡销售,倒也在增进商品流通上起了不小的作用。还有的猪贩将售猪所得之现款交给家乡商店去上海的进货者,或在上海读书的学生,凭收款者的一张字据回到家乡取款。在银行及邮汇都不方便的当时,猪贩们又成了社会上金融流动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当年的通州路,如皋猪贩是很熟悉的。

如皋张黄港是生猪转运中心

地处如皋长江北岸的猪行,起初分设在新生港和张黄港,后来新生港被永安沙阻塞了,便都集中到张黄港。抗战前,地方政府对开设猪行的资格限制不严,税捐也不重,于是张黄港的猪行一段时期发展到数十家之多。在张黄港众多的猪行中,能够站得稳、开得久的要数陈国良的聚成猪行,倪士信的大信猪行,陈秉五的大新猪行,钱五奶奶的振记猪行,以及何绍宗的